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第五届天下论坛

研以致用：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工作研讨（二）

2020年10月24日-25日

2020年10月24-25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天下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研以致用：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工作研讨”，旨在进一步突破高校智库工作的瓶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建设新型智库更好地融合发展。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17所高校的近50余位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高校智库的管理者围绕“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的目标与方法”“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的问题与解决方案”“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的评价体系”三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二）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对中国地区国别研究的发展趋势及高校智库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地区国别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指出中国地区国别研究的开创时期是上世纪60年代，以北京大学亚非拉研究、南开日本研究、武汉的美国研究、复旦的欧洲研究等为代表；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地区与国别研究结构进入系统性的形成阶段，成立了一大批地区国别研究学会，尤其是在国别史研究方面，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史学会纷纷成立。一些和经济、文学相关的研究开始出

现，以美国研究为例，美国经济、文学、历史和政治四个学会共同构成了美国学会。黄仁伟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的地区国别研究比较符合学术逻辑，当时世界史下设地区国别史二级学科，但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地区国别史为基础的地区国别研究不复存在，研究者大多关注个别国家的热点问题，基础研究无人过问。

黄仁伟观察到，近 5 年时间中国地区国别研究呈现第二个高潮。教育部至今已建立了几百个地区国别研究基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地区国别研究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一哄而上、良莠不分的问题。有鉴于此，需要重新界定地区国别研究的概念，它应该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一国的语言、文化、历史，这是国别研究的基础；其次是将社会科学和地区国别相结合，例如研究美国时从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和社会等方面入手；第三个层次才是研究该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或者该国和中国相关的重大问题。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地区国别研究的三大板块。然而，以目前国内美国研究为例，基本都集中于对第三层次热点问题的讨论，其中又以中美关系为重点。欧洲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研究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而这样的地区国别研究是不具备生命力和潜力的。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区国别研究在历史中出现了几次高潮也走了几次弯路，有必要在当下认真考虑地区国别研究的本质、学科逻辑和发展方向。黄仁伟指出，高校智库做地区国别研究的主要优势有三点：第一，基础学科强大，这是最大的优势；第二，综合学科研究能力较强，这包括所有学科

及跨学科；第三，学科人才梯队容易形成。但高校的弱势也很明显：其一，和国家战略对接比较弱；其二，一线调研能力弱，很少有研究人员能到研究对象国常住，也就无法成为该国的专家；其三，不少教授倾向于独立作战，缺乏研究团队；其四，快速反应能力比较弱，无法满足决策和市场需求；其五，地区国别研究人才奇缺，需要大量吸收对象国的人员参与研究。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针对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的目标分类和方法进行了阐述。他指出：第一，近年来智库的膨胀式发展实际上不是学科需要推动的，而是由政府的要求推动的，整体来说高校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第二，目前中国的智库大概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类，公办智库从体制上可以划分为高校、社科院和政府机构三类，从学科和发展情况看，目前只有高校智库还在做基础研究，这是高校智库的特点，不能丢弃。第三，目前高校智库的目标定位与教育部的要求并不一致，除国际关系外，也要进行基础研究。

杨恕认为，目前需要重点厘清区域与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之间的关系。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以“内”为主的研究，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是以“外”为主的研究，如此一来，国际关系研究和地区国别研究的分工就很明确了，当然，二者之间也会有少量交叉。其次，对冷门小语种的研究和政府的支持密切相关，学校不用考虑小语种是否要持续发展，其应该考虑自身是否具备支撑小语种发展的能力。第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搭配中最应该加

入地理学，因为地理二级学科分支包括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又包含了交通地理、人口地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植物地理、动物地理等各方面，很多部分都同区域与国别研究重合。最后，应当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边界和方法给予特别关注。针对某一地域语种进行招生的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语言是一个地域最基础的特征。但学科组合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选择的模式应该不同。

杨恕最后强调，基础研究和多学科综合是高校智库的特长，应该发挥特长做出自己的特色，要创新而不是模仿，要求求真务实而不是哗众取宠。高校智库建设原先以论文数量作为衡量标准，把期刊分为核心和非核心，核心之中又再分等级。如今，智库建设以批示做导向，将行政官员的行政级别作为报告质量的判定标准，这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学科里尤其不能如此。中国作为大国，全球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基础研究是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学科重点。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可以做咨询工作。但咨询不仅限于现状问题，现阶段区域与国别领域的研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补课”，对此不能太急功近利。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姚远梅副教授结合自己前期的研究基础和当前的中印边境现状，从克什米尔问题出发分析了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潜力和时代需要。她认为，印度自莫迪政府上台以后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出台了新型国家安全战略，导致当前中印边境呈现对峙的现状。这一国家安全战略是以中美博弈为背景的，也出于印度国内的需要。在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实行民主体制，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莫迪

政府上台后在印度人民党及其母体组织 RSS 的支持下，借国家安全议题在印度内外进行全面改革。

新型国家安全战略是依托英属印度时期的印度科学边疆战略，通过建立一些边界观和安全国家观建构起来的。内容是以“克区”为重点联美制华，重新叙述历史，由此来建构印度的内政、外交、军事、国防，最终目的是实现新印度和印度大国梦。手段是以“克区”牌为主，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前进边界”政策，同时打印度教牌（因为印度 70%的居民是印度教徒）并运筹大国关系。英国的“克区”边疆战略是 19 世纪英俄大角逐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出台的。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已经站稳脚跟，北美实际上已经独立，英国于是出台战略，以印度为中心建立第二英帝国。经过内部讨论认为，要把印度防线往山上提至一个可以保护印度的地方，为此美其名曰“克区”边疆战略。该战略分三段来建构，分别为辛都库石山区、克什米尔和喜马拉雅山区。英殖民者在推行该战略的 150 年里有意只做不说，战略内容只存在于英国的档案里，外界很少知晓。

此前印度政府也曾有过同样的战略企图，但时机尚未成熟。莫迪政府上台以后见证了中美之间的博弈，认为时机成熟了。印度政府很少对外提及该战略，但会在内部进行讨论。印度国防部下的 BHARAT SHAKTI 智库曾有这样的战略。姚远梅表示，她是在参加一个高级别智库论坛时得知此战略的，当时印度前国家安全副顾问的任务便是宣传这一新型安全观。在打出新的国家安全牌后，印度的内政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以前的民主体制，莫迪政府拥有很大权力。外交方

面，印度过去是一个不结盟、战略自主的国家，而印度外长苏杰生（S.Jaishankar）在刚出版的著作中主张“engage America, manage China”，所以印度当前在四边机制、美印“2+2”对话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积极。

“克区”是十分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印度人现在的处理方式和英殖民者如出一辙。印度此时打“克区”牌可以轻易实现一举多得的目的：2019年印度重组“克区”，变为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强化封锁中国的阿克赛钦。“克区”牌帮助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的大选中获胜，查谟-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被废除，印度人民党直接控制了“克区”，同时以拉达克为依托进一步深锁巴控“克区”和中国的阿克赛钦，为进一步“前进边界”做好舆论铺垫。克什米尔问题是经过联合国裁决的，莫迪企图利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撬动大国关系，进而实现它的大国梦。

姚远梅总结道，从克什米尔问题来看，英殖民时期推行了100多年只做不说的战略，最后取得了成功。莫迪政府也出台了只做不说的国家战略，造成了中印边界对峙的局面。从学术角度来说，许多档案里的历史知识值得被挖掘出来并公布于众。从国家决策层面看，印度政府基于长线研究做出了战略并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目前来看很有成效。“克区”牌已经实现了第一、第二层目标，正在向第三、第四层前进。它每走一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中国应该思考如何应对。总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前景大有可为，但任重而道远。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方副教授从非洲研究

学科的特殊性出发，探讨了非洲研究的目标和方法。她首先表明，非洲研究在区域研究的视角之下存在着“危机”现象。一位英国学者曾指出，从来没有哪个学科像非洲研究一样始终讨论自己的用处。实际上，随着英帝国的收缩，它已不再看重非洲研究，这位学者最重要的感受不仅仅是缺少经费，不能到非洲一线调研，更重要的是跟非洲区域的学者存在隔阂。

美国也有所谓非洲研究危机的说法。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会长海登教授 1995 年提到，美国的非洲研究是因为要支撑自己的冷战战略需求，所以 1990 年以后非洲研究和其他地区的研究都在发生变化。海登教授认为研究必须超越狭隘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要有更多其他视角。2000 年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著文阐述他为什么放弃非洲研究，引起了国际轰动。许多学者与他产生了共鸣，人们由此重新反思非洲研究的特殊性。

非洲研究的“危机”是全球现象，但各自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英国最早的非洲研究作为殖民研究而产生。1915 年就在英国王令之下开始了非洲研究的建设，但比较早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都是为了帮助帝国殖民统治。因此，当非洲人自己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时候，这些研究所都面临着身份危机。他们开始转型培养非洲人，大规模的欧美人到非洲研究机构、大学里任教，经常被称为“第二次殖民主义入侵”。如果说起初殖民事业是支持帝国统治的，到后来则已经变成了思想桎梏，所以如何去殖民化、去种族化依然是非洲在欧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非洲人夺回思想主权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非洲研究虽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它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受种族政治的影响，最重要的资源和机构被白人学者把持，非洲裔的学者一直无法获得足够支持，所以长期享受盛誉的所谓创始人，在目前非洲学者的反思中是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的非洲研究除了万隆会议以来的国家需要之外，还有学者自觉的拓荒。北大的非洲历史研究实际上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国家号召，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今天中非关系研究俨然取代了对非洲本土的研究。中国对非洲的记录、研究其实远早于同时代的欧洲人，但是后来简单地把欧洲人的种族主义非洲观引入中国，影响了中国学者今天的认知。另外，中国对非洲的认识存在很多公共认知误区，而大学在公共知识的传播中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刘海方特别提到她在会议前一天参加了全球妇女大会 25 周年暨非洲女性和平安全 20 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由非洲关于女性的重要智库所共同发起的线上研讨会。会上众多学者都感谢了美国的重要贡献，但同时都表示想倾听北京的立场。由此，刘海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关心世界，而大学应该承担起部分工作，特别是对非洲这样被世界边缘化、长期受压抑的地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德正教授在发言中坦陈，聊城大学的办学层次和所处位置都不太适合进行国别和区域研究。但 8 年前学校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和中国走向海洋的战略大局，确定了太平洋岛国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作为岛国中心建设 8 年来自始至终的参与者，

他分享了关于地方高校国别区域智库建设的几点想法。

第一，高校智库不同于学术研究机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术研究机构只要有梯队、有资料就可以静下心来潜心于此。高校智库所面向的对象除了学术界，更重要的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这种特性决定智库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和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对接，不但与国内对接，还要与研究对象国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对接。这就要求智库负责人更像一个管理者、组织者和协调者，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学者。

有鉴于此，岛国中心对内推动学校增设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本科专业，邀请萨摩亚专家给学生开设萨摩亚语课程。在硕士招生中设置了太平洋岛国研究方向，每年招收5位太平洋岛国研究硕士生，形成了智库、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体系。对外通过举办高层论坛、外交官论坛，定期拜访政府部门，邀请外交官短期讲学，选派智库成员赴岛国支教、调研等渠道保持衔接。中心与山东省外事办公室建立了合作关系，与聊城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所以，要想做好智库就得把它当成系统工程，把研究做好的同时理顺对外关系，保持上下左右的衔接和畅通。

第二，高校智库应该立足于学术但又必须超越学术。高校智库必须植根于学术，禀承学术的求真求实精神，没有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智库肯定难以走远。但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又不能局限于常规的学术研究。目前中心智库的学术班底基本以世界史研究为主，但历史研究对现实保持着疏离。而智库负责的对象都是出于解决当前问题的需要才寻求智

库帮助，这就要求以世界史班底开展起来的国别区域类智库必须突破学术研究的惯例，把研究对象延伸到现实中，甚至延伸到研究的当天。

太平洋岛国中心的做法是，在最初几年尽可能地收集研究资料，同时还研究开发了数据平台，出版岛国历史著作，发表论文，打好学术根基，再逐渐向现实延伸，把历史和现实贯通为一体。截至目前，岛国中心人员一方面主持承担了四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占研究领域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的70%；另一方面在媒体发声，发表纪实太平洋岛国的国际视频，向上级呈递研究咨询报告。研究队伍当中既有世界史研究者，也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旅游管理、外国语言文学等相关学院的研究者，学科结构基本趋于合理。

第三，国别区域类智库依赖于政府支持，但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岛国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与各级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密不可分。没有支持就没有启动经费，没有外出调研的机会，没有确切的信息来源，甚至没有学校的鼎力支持，所以与政府保持沟通是高校智库的立身之本。但是，国别区域类智库又不同于其他智库，除了与国内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打交道外，还必须与研究对象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保持联系畅通，否则研究就成了闭门造车、无源之水。然而与对象国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保持联系畅通的前提，就是不能让对象国感觉高校智库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以便于他们更为容易地接纳中国智库的访问和调研，智库也才能更好地承担起中国与对象国民间友好往来的中介作用。保持独立性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智库所做的结论首先要

基于事实判断，其次才考虑价值判断，这样做才能够使智库报告更有价值，为上级有关部门提供更好、更准确的决策和参考。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表示，高校智库应坚持学术本质，它的定位非常重要。比如，2011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官方收到一份报告，内容是利用这次机会把日本学者引入中国。但收到报告的人曾长期留日，了解日本，并没有将报告交给中央。结果日本学者不但没有从国内震区流向国外，反而所有在国外的学者都回到了日本。撰写报告的学者用自己的想法考虑区域国别问题是冒险的，原因在于他或许并不了解该地区或国家的文化和心理状态。在这个例子中，作者对于日本人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在明治维新后的发展并不了解，由此对于日本人爱国的“无痕化”没有研究，造成误判。

韩东育指出，只有以学术研究做基础，了解它的历史纵深，才会知道今天的情况。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时，应该将了解周边国家心态放在首位。国内学术界在钱乘旦教授的帮助下提出了“学术戍边”的问题，就是用学术戍守、保护边疆，而不是过度依赖于政治家和军事家。许多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学理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更不要谈法理了。对此，学者应该担当起应负的责任。

学术本质的问题在于，历史学者是否能发挥智库的作用。习主席指出，历史研究是所有人类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也表示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学。中国古代的思考方式已经提供了两个认识路数，一是《吕氏春秋》的“察

今知古”，另一个是《史记》的“述往思来”，二者并不对立，必须结合起来才有完整的历史，最终找到问题的基因和纵深感，同时，也应该将微观和宏观相结合考虑问题。

孙子曾说“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韩东育认为，智库工作中保持言路畅达非常重要，智库成果可以不公开，但要讲真话和实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君子既不失人又不失言。在教育部的良好愿望和部署下，各类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已经遍布全国。但是，教育部得根据中宣部和外交部甚至中联部的意志来执行某些说法和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宣部、外交部包括中联部是以国家需求来要求大学智库的，然而大学智库的最大特点是学术本质，一旦离开了学术根本，研究将会缺乏深度、广度和力度。所以一定要想办法给大学一定的言论自主权，当然这个自主权是有纪律约束的。

在讨论环节，杨恕教授指出，目前国内高校研究气氛、学术自由的情况并不乐观，研究国家重大问题所涉及到的禁区越来越多，比如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同时，高校智库应该发挥其真正优势，研究历史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钱乘旦教授对杨恕教授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关系表示强烈赞同，即前者是对“内”的研究，后者是对“外”的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的发言围绕“基辛格综合征”和“两张皮”两个关键词展开。“基辛格综合征”由王逸舟提出的“基辛格症候”一词而来，“基辛格症候”表明，国际政治学者的权

力背景很关键，和权力联系越紧密其影响就会越大。“综合症”通常表示一种病状或现象，但杨成教授不希望把不好的发展势头描述成一种病态的现象，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要去克服的趋势，所以使用“综合征”一词。

“基辛格综合征”和区域国别研究学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这并不是新现象，而是一种全世界都有的现象，但在中国的症状可能较为严重。梁启超先生早年说过“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哲学思想则常随政治而转移，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学者“好为帝王师”。如果学术要为政治服务，就该实事求是，反映真实的情况，这才是真正有用、服务国家利益的研究。如果学者都迎合、揣摩上意，便会出现大问题，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学术研究的本质是追求真理，政策研究是追求应用，从本质上而言是两种逻辑。

关于“两张皮”的问题，杨成通过他在外交部7年和在俄罗斯使馆研究室5年的工作经验指出，许多文章的理论叙述很长，可操作性建议价值不大，决策部门也缺乏前瞻性思考。尤其现在不少外交官都是学习语言出身，但学外语和做其他的学科研究的逻辑不一样，前者看重模仿能力，后者要求原创。在智库所做的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两张皮”严重脱节，有的是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有的可能是缺少对地方性知识的掌握，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支撑，所以很多研究成果出现了大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杨成分享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解决办法。上外在人才培养方面花了很大工夫，提出了解决“基辛格综

合征”问题的方案，主张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结合。其中在政策研究方面要有基础性的学术做支撑，为了解决“两张皮”问题，要重视田野调查，强调均衡的知识供给。以上外欧亚班为例，学生至少要学习三种语言——俄语、英语和当地语言。而按照原计划，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学生们会分别在中亚、俄罗斯和西方发达的中亚地区学术重镇进修和实践，为期一年半，以期建立“双城视角”，在研究中关注对象国和地区的主体思想。

南开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强教授分享了他所在研究中心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表示，希腊研究中心建立之后面临着转型的问题。首先进行结构调整，引进新人才，同现代希腊和当代问题相联系。同时调整师资结构，增加兼职岗位，有针对性地在希腊安排了两名常驻研究员。此前做古典研究的学者在继续原来研究的同时扩充自己的思维，把研究往当代延伸。增加了新的领域和方向，增强近代以来希腊研究方面的力量，并没有放弃传统优势。此外，进行“实体化”建设，为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源，包括办公地点、设备、资料等。

陈志强教授分享了这个过程中的体会。第一，要转变思维。包括校长、院长等老一辈学者在内，都应该转变纯学术研究的思维，认识到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中心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学者在转型，校领导、院领导也在转型，如果没有校方的支持，在人、财、物各方面进行政策倾斜，中心很难发展。

第二，提高服务意识。过去学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教

学，至多参与学院和社会有关的工作，但现在老师们从思想上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中国现在处于关键期，要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大国不能只靠经济，还需要学习，这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智库发展也是如此，需要有宽容心和耐力。目前的网络环境反映了当下国民心智不够成熟，还没有真正培养成大国的国民心态。研究人员也需要提高服务意识，积极参与学术会议和与政治学科、关系学相关的会议，一方面和教育部上级主管部门积极协调，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各个智库、中心的交流活动。

第三，主动融入到国家战略当中。为了把握好国家战略前期科学决策的机会，学者们要不断学习、跟进，发挥高校在学理方面的优势。正因如此，希腊研究中心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取得成就，现在拥有两个国家重大项目，有一些学科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在学术上是超前的。

最后，要努力打造一流。陈志强建议将来可设立高校智库联盟或类似的机构，印发文字性的材料用于内部推广，大家交流经验、共同进步。紧盯国际前沿，多举办类似此次研讨会的会议，积极地和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

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吴浩教授介绍了高校区域国别智库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实践。他指出，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三大功能，即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人文交流作为大学一项新的重要功能。特别是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里，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访问里经常使用相关的话语体系进行阐述，认为人文交流、政治互信、经贸

合作一道成为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三大支柱，中俄、中美、中英、中欧等 9 个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相继建立。

吴浩认为，高校区域与国别智库在某种意义上也要践行全新的人文交流功能。他分享了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前，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发起了一项针对 20 个“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的调研，提问他们想把当下哪些生活方式带回自己所在的国家，最后得到的选项是高铁、支付宝、网购、共享单车等，被形象地比喻成“新四大发明”。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不属于重大的高端科技，但却是外国留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对中国在生活方式层面所取得的创新的认可。第二个案例是疫情期间北外丝路研究院和北大董强教授共同策划，通过网络手段举办了中法云雅集活动。出席活动的都是两国教育、科学、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活动策划之时得到中央外办的高度认可，甚至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批示。第三个案例是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采访了汪荣祖先生和布立赛先生，以纪念圆明园罹劫 160 周年。

吴浩对高校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和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它们之间有重复，存在犬牙交错、相辅相成的情况，其中区域国别研究赋能中外人文交流，对中外人文交流提供学术支持。其二，中外人文交流丰富了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外交流中可以把握四个纬度，“时”是历史的纬度，“空”是地理的纬度，“主”是文化自觉、文化主体性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客”是重视对象的意识。同时，要在推动人文交流时秉持四个属性：民间性、

学术性、国际性和前沿性。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汪诗明教授对学会在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工作中的角色进行了重点阐述。他认为，学会可以在高校智库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学会，尤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学会，将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明确地写进了组织章程，现在智库发展遇到非常好的时机，它的重要性充分展现出来。另外，现在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特别多，像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这样建制完整、影响广泛的机构并不多。很多机构存在问题，如果把相关学会联系起来，可能会起到一定帮助作用。譬如，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中心的力量很薄弱，但是陈德正教授就很好地利用学会弥补了科研力量配备不足等相关领域的缺失。

在汪诗明看来，学会和高校智库合作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学会必须是开放式的。传统的学会强调学术性，讲究学科分类，研究领域界限明确。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智库专家拥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背景，所以学会必须是开放式的。其次，必须把智库工作放在学会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在合作方式上，一是应建立经常性的联络机制。比如，设立秘书处，建立对接关系，负责人可以建立工作会议机制，经常就智库建设、师资队伍培养、议题选择进行交流。二是举行学术工作坊。三是将一些智库项目通过学会做委托研究，这方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做法较好，他们每年都将一些课题通过学会向学会成员进行招标。

（三）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的评价体系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院长罗林教授对高校

区域与国别研究评估体系的建设做了详细介绍。他表示，经过8年的探索和完善，我国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本实现了研究国家和区域全覆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国家对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总体要求，总结国际与国内权威智库评估设计思想和方法、技术，着眼高校五大基本职能，运用科学精准的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成效，对进一步完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2019年11月和2020年5月教育部分两次对42家培育基地和395家备案中心进行了评估。评估指标、框架基于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和基地的五大职能：咨政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从结果看，第二次评估比第一次更为理想，因为评估目标的指向更加明确，不为评估而评估，而是发挥长远、综合效应，明晰政策导向，明确发展方向、标准路径，筛选最优，淘汰最弱，为进一步优化整体布局奠定科学基础，也为未来国别和区域研究新的备案中心设立更为合理的标准和门槛。同时，第二次评估也有一些值得思考和改善的地方：在确保评估指标和数据的相关度上值得进一步完善；评估数据筛选标准也有提高的空间；由于第二次评估把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权重、主要观测点和权重等对各备案中心公开了，所以从评估的效果上来看存在一些中心和高校用力过猛的现象。总体而言这次评估的结果是正面、积极的，这次评估只是一次探索，今后还会根据各种意见不断完善。

据介绍，今年开展的评估工作所采用的评估指标体系框

架一共分为三层，由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29 个三级指标构成，涵盖机构建设、成果和影响力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基地保障力，就是实体化建设，该指标权重为 0.3。下设 4 项二级指标：机制建设（权重 0.3），包括基地定位、建设目标、发展规划和其他相关的纲领性文件，主要观测基地依托学校的学科建设方向，基地建设的总体目标，学校和基地中长期发展规划等，了解学校对机构的重视程度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队伍建设（权重 0.3），其中专职教师权重是 0.6，兼职教师 0.4；经费投入（权重 0.2），该指标下设政府投入、社会投入、学校投入三个子项；资源建设（权重 0.2），具体包括场地建设、数据库、基地网站和基地刊物。

第二个维度是成果生产力，是机构综合实力的综合体现，权重为 0.4。包含 3 个二级指标和 11 个一级指标：咨政成果（权重 0.4）；科研成果（权重 0.3），包括科研项目、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科研奖励和会议报告等；学术发展（权重 0.3），包括学科建设、培养方案、参与科研和学生交流等。

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影响力，指基地研究成果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拥有的话语权与舆论引导力，权重为 0.3。包含 3 个二级指标和 5 个三级指标：政策影响（权重 0.5），如咨政采纳、政策性文本采纳和科研项目采纳，通过观测采纳的数量和级别，得出基地服务国家决策、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强弱；媒体影响（权重 0.2），在全媒体时代，媒体报道次数越多、级别越高，表明基地的社会和行业的舆论影响力越高；国际影响（权重 0.3），世界一流智库应具有不断开阔、

逐渐辽阔、日益壮阔的国际视野。

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未来的发展计划，罗林表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共同推进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一级学科，从区域国别研究总体布局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引领各高校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其次，应探讨设立由教育部所主导的全国国别和区域研究学会的可行性。第三，共同努力编写能够引导区域与国别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材。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教授梳理了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的研究重点。作为长期从事智库工作的研究者，他深感智库工作和高校的主要工作存在脱节的情况，所以2017年开始他借助教育部区域与国别中心，尽量使政策研究、智库工作和学术研究、基础性研究保持平衡发展。

郭延军指出，智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独立智库，其意见有自由性、自主性，也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实操性；第二类是政府或者国际组织的智库，政策性较强，也有一些专业性，更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第三类是高校智库，综合了前两类智库的特点，具有综合性、学术性、基础性、思想性。智库成果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思想性的成果；第二类是知识性的成果，这是高校智库应该重点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三类是信息性的成果。

郭延军认为，高校应致力于生产上述几类成果，为此他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的定位是解决问题，但是目前很多高校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并不强。二是坚持政策导向的同时应重视基础性研究，基础性研究是长期性、战略性的研究。三是注重创新的同时应注重学

科和学术发展规律。四是注重一二轨互动，同时保持智库的独立性。近年来官方对智库越来越重视，一二轨互动过去主要是单向的互动，由政府有关部门交给智库研究任务，现在慢慢变成双向，智库主动提出一些意见、建议或思路供政府参考，这是非常好的趋势。在这个基础上要增加智库的独立性，多提批评性意见，而不仅仅是作为政府的发声筒，这是高校智库的重要性所在。五是坚持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开放性。现在国内网络的布局已基本形成，未来的工作要注重国内和国际互动。六是兼顾区域和国别研究，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目前比较成功的做法是从两个方面去讨论某个议题，一方面是区域合作的国别观点，另一方面是国别方面的区域分享。没有深厚的国别研究基础，区域合作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而没有区域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把握一个国家的政策战略走向。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周边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卢光盛教授基于云南大学的经验分享了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问题与应对。据他介绍，云南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从1964年成立的西南亚研究所开始，1996年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2002年成立了西部地区最早的国际关系学院，因没有本科生而改为国际关系研究院，一直沿用至今。此后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智库工作的机构，比如周边外交研究中心，2015年之后分别成立了缅甸研究院、印度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等实体机构。今年将原来的国关院和周边中心及“一带一路”院、缅甸院、印度院等机构整合进新的国际关系学院之中。云南大学智库方面最主要的机构有两部分，

一是缅甸、澜湄、印度、非洲、孟加拉国、伊朗、中南人文交流中心和“一带一路”院等8个教育部区域备案中心；另一个是教育部批准的协同创新中心，近年取得了一些建设进展。

作为云南大学智库建设中的亲历参与者，卢光盛感受到一些问题的存在。首先，对高校智库的定位存在困惑；其次，缺乏专门的管理办法、投入机制、评价机制，以保障智库的积极性；第三，高校智库在信息获得、调研渠道、报送渠道、成果认定等方面都存在先天结构性矛盾。他还强调了“显示度”的重要性，表示应争取得到政府、省领导们的关注。

卢光盛认为，为解决这些问题，高校智库首先应该进行特色发展，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的重点应放在东南亚和南亚，致力于把这些地方的研究做好、做深、做实。要为别人所不能为，做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机构不好做的事情。比如开展境外调研、田野考察、国际联系和公共外交，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曾经组织过国内优秀的专家学者到缅甸国会去宣讲中国的政策理念。此外，也可考虑吸收政府、部队、企业、中外媒体等领域的人员参与研究，要重视培养真正掌握对象国语言、学习对象国文化和拥有海外渠道、人脉资源的人才。

卢光盛指出，云大国际关系研究院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成为高水平、特色鲜明的区域研究机构。目前云南大学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工作的人员共有50多人，大多年轻有活力，人员比较齐整，除了行政人员外有40人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目前正在推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培养项目，招入小语种本科生，加以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区域与国别研

究理论方法和能力的训练，以期将来能够为培养真正的区域与国别人才做出贡献。鉴于可持续发展也是智库发展的重要问题，许多人都担心经费不足，为此要争取政府的投入，拿到国家级的牌子，还要寻求社会的赞助和合作。以川大国关院某对外智库为例，目前一些智库正在朝市场化的咨询公司发展。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沈海涛教授从智库内部参与者和基层微观的角度，谈了关于智库和区域与国别研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以及较好的经验和做法。另外，他也从智库服务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角度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思考。

沈海涛认为，应该找准智库工作的核心，所有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大政方针、为整体战略服务的，政府政策调研和基础学术研究不能分开，目标定位通常处于一种既交叉融合又各自独立的状态。吉林大学是国内最早成立国别区域研究的单位之一，学校成立了很多智库型机构，在各个层面都共享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为中央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支撑。在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东北亚区域合作，甚至包括“一带一路”建设跟东北地区的衔接等方面，吉林大学的智库有不同的职能分工，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成效。

与此同时，个体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作为大学老师，应该完成工作评价体系中的任务，但作为智库人员，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含有水分甚至没有用的，可能连基础性研究都算不上。校内智库人员所做的既不是机制性研究，又不同于校外智库专业人员所做的应用研究，这中间存在灰色地带。沈

海涛表示，他所在的东北亚研究院作为教育部智库基地叫做东北亚研究中心。这其实是一个机构、同一批人员，挂着两个牌子，很多老师对自己的定位产生了困惑，这是定位模糊、功能发挥倒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对对象国的基础调研严重不足，成果泛化。此外，组织管理模式方面效率低下，大家自由散漫，完全凭个人兴趣喜好做研究，这非常不利于智库的发展和变化。

针对这些问题，沈海涛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第一，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协调。高校智库的定位并不清楚，应在体制建设方面更加明确。第二，从过程开始把研究和政府应用有机结合，将问题意识、课题设定、效果反馈进行统一协调。第三，协调高校智库工作和相互间的合作问题。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旭副教授对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进行了分析：一是“一带一路”及周边外交对当前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二是对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思考；三是对当前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思考。

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培养的是技术专家，而不是大外交、大战略专家。对于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首先要精通对象国语言，同时英语也必须熟练，此外还应全面了解对象国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社会。非通用语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但懂外语并不等于懂对象国，书本和田野之间的差距很大。

王旭对当前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一是广

义狭义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人们往往把区域国别研究简单化，将其等同于现状问题研究，实际上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二是高校的区域国别智库与传统智库的区别问题。高校的研究和传统智库各有优势，传统智库有政府背景，长期跟踪现状问题；高校智库一方面与政府相关部门信息交流不畅，另一方面研究力量薄弱，人事、财务、科研绩效、项目管理等配套机制特别受限。但是，高校智库的优势在于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而不是专门写咨政专报，才是高校智库的强项。

王旭认为，高校智库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做好人才培养：一是老师们要自我提升，深入了解对象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加强国内外的跨学科交流；三是以课题带动科研团队的培养；四是做教学改革创新，增加学生的科研参与度。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更多的“国别通”。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办公室主任靳戈表示，北大党委宣传部从2018年起与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开始合作，共同推进以北大学术资源服务中央决策。在参与智库工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中国越是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智库服务中央决策的价值就越显著。他同时也感到，高校国别智库评价工作距离当前比较成熟的学科评估、教学评估等体系还有较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并非源于缺少评价体系，而是由于智库评价从其他领域的评价体系中借鉴了很多内容，但借鉴来的体系在问题针对性和工作衔接性上不够充分，有时可能不利于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守住“初心”，反而会让智库“分心”。因此，他重点分析了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评价中的问题意识，

从回归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创建的原始问题出发，谈论了评价体系如何构建，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以评估推动发展的作用。

第一，既然是智库，就要坚持“决策导向”。从内在的发展需要和外部的经验两方面来看，智库的评价必须坚持“决策导向”。智库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其研究解决的是不是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最急迫的问题，是不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不是各级党政机关急需问诊的问题，更要看研究成果最终转化为决策的效果如何。坚持“决策导向”不意味着“唯报告论”，也不意味着“唯批示论”。从中央的要求和工作的实际来看，智库要写好咨政文章、学术文章、媒体文章，分别对应决策支持、学术研究、交流传播三项职能。

第二，既然是做区域与国别研究，就要坚持“精深导向”。国际关系学已经拥有了较为独立的问题意识、学术范式、思维方式和学科体系。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高级阶段，当然不能仅依靠阅读英文书或英文报纸，必须有实地体验作为支撑。区域与国别研究要做好扎根研究、交叉研究、历史研究三个方面，即扎根当地风土、交叉多学科思考、关注历史传统，以中国的立场、当地的视角，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储备和学术基础。总之，对于区域与国别智库质量的评价，必须要看关于区域与国别的研究是否精深，而不是浮于表面，单纯以量取胜。

第三，高校智库必须坚持“育人导向”。政府部门、科研机构 and 高校都在做智库，必然是各有侧重、各有特色。高校智库的特色，可能不在于资料新或者力量强，而在于各学

科的研究生、博士后这些绵延不断的生力军。智库不是关起门来思考，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是智库工作的题中之义。学生参与其中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开工作的视野，并且优秀的学生可以及早得到锻炼、独当一面，为今后各方智库工作储备力量。在智库成为国家发展重要需求的今天，高校智库工作理应成为人才培养体系的一部分，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更能涵育学生的国家立场和家国情怀。应建立“学-研-智”即教学、研究、智库三位一体的教学改革方案，在教学中引入智库所关注的问题，鼓励学生围绕问题开展研究，通过智库渠道报送高质量的成果，以成果反馈作为教学激励。

在讨论环节，杨恕教授强调，在学术环境方面 80 年代有句话叫做“学术无禁区，新闻有纪律”，北大在这方面可以起到榜样作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第一任务不是智库，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学科界限方面，不同地域、不同国别的学科组合差异会比较大，学科组合十分复杂，需要更多的探讨，而在区域国别研究或者综合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不能丢掉大前提，更不能和国际关系趋同。

罗林教授补充道，高校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国家专项实际上涵盖了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换言之，智库建设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教育部两次对基地和中心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摸清家底，评估比较麻烦但又非常必要。针对杨恕教授所说的学科建设问题，他认为高校中的学科建设是“纲”，其他都是“目”，只有抓住“纲”才能做好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现在需要凝聚共识，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新的精神，如果能在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下成功设

立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将有利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各项工作的推进。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此次会议指出了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工作的很多问题，也提出了不少建议。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件易事，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和努力。今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工作有以下几个努力方向：一是在学科建设方面，交叉学科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现成平台；二是个人、学校或者研究所、中心不能单兵作战，应该在全国建设一个机制，形成一个网络，在内部互相通气，一块发声，形成合力。三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四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是新生事物，它需要成长的过程，尽管现在有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各方应帮助它成长。